

历史研究

·上册·

(美) 费因比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历史研究

·上册·

(英)湯因比著

曹未风譯

RD06/24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
BY
D. C. SOMERVE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London
1947

原書是“牛津大学出版社”1947年出版的D. C. 桑末
維尔的1—6卷节录本，本書根据节录本的1—3卷譯出。

历史研究

·上册·

(英)湯因比著

·曹未风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公厘 1/32 印張12 1/4 字数274,000

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統一書号：11·074·246

定 价：(十三) 2.05 元

封面設計：冒怀苏

对湯因比著“历史研究”1—3卷的批判

(代序)

曹未风

阿諾德·湯因比 (Arnold Toynbee) 的名字一年多来已經在我国的报纸書刊上出現了好多次。在絕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名字是和右派分子雷海宗、林同济等人連在一起的。湯因比是他們的一个祖师爷，我們批判右派，和右派的猖狂进攻做斗争，当然是要挖到他們的洋祖宗的。于是湯因比就在我国解放以后的历史界获得了一点“名声”。

阿諾德·湯因比是当代英美资产阶级历史界里的头面人物。他是英国人，生于1889年，现在还活着。他写过不少历史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历史研究”。这部“巨著”一共有十卷，是分三批出版的(1934年出版1—3卷；1939年出版4—6卷；1954年出版7—10卷)。在他的前六卷出版以后，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后，资产阶级的历史評論界就象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对这部書异口同声地大加推崇。美国的“星期六文学評論”称它是“无尽的知識宝庫”，美国的“耶魯大学評論”称它是“我們这一代人的一部重要著作……可以和圣·奥古斯丁，維哥，勃克勒，斯般格勒等人的著作并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湯因比的名声特別响

亮。1946年美国的索麦维尔(D. C. Somervell)为他的前六卷编写了一个一卷本的简本,这个简本重印了许多版,一时成为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最畅销书之一。编写简本的这个做法,事实上是已经把汤因比列入“古典作家”之林了。资产阶级学术界是惯于拿“声名”和“学问”吓人的,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汤因比就成了当代有名的“大学者”。

早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右派分子雷海宗、林同济等人就把他的所谓“历史形态学”贩卖到中国来。那时正在皖南事变以后,反动派的统治日趋疯狂,美帝国主义的势力急剧地向中国入侵的时候。资产阶级学术界的各种反动理论和学说也涌向中国来。各种各样的反动“学者”贩卖这种或那种的“理论”到中国来,一方面为反动统治寻找“理论上”的根据,欺骗人民,一方面也是为他们自己制造政治资本,以便于取得反动统治者的青睐。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革命斗争形势,迅速胜利开展,我们党在知识界和青年当中的影响不断扩大,类似汤因比的这些反动学说的影响,在中国学术界只限于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流传。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学术界已经在从去年起的批判右派分子雷海宗、林同济等人的斗争中,加以揭露批判了。但是汤因比的历史学说并不是他自己独创的,他是在一定程度上相当广泛地总结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说的全部理论,并且提出了和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的说法;同时他的“学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相当迷惑人的声名,和相当广泛的影响,因此,在我国学术思想界更进一步地揭露他的反动实质和彻底加以批判,对于开展我国学术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捍卫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历史学界插红旗,还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这也是我国历史工作者在全世界的范围以内,参

加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学术斗争的一个重要責任。

二

“历史研究”这部書談的是什麼問題呢？从表面上看，它是闡述研究人类的文明发展史的（有人把这部書列在“史学史”的範圍內，是不很合适的）。湯因比是企图用人类历史（尤其是文明史）的全部过程做材料，証明他所发现的一系列的“規律”。但是实际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們要注意他写这部書的时间条件和地点。他起意写这部書的时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資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經濟危机的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期。而完成这一部“巨著”的时候，已經到了第二次大战以后的五十年代。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根据莫斯科宣言上說的，“我們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也就是毛主席所說的“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在学术思想界，馬克思主义已經在世界範圍以內，成了一种深入人心的思想体系。而湯因比却在这个时候，提出一种解釋人类全部历史过程的“新学說”。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与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因此湯因比的目的，并不是象他自己和一般人所說的那樣，是“学术性的”，而是具有政治上的显明企图的。这一点在他的著作里，可以显明地看得出来。他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用历史来証明，欧美資產階級，也就是他所說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乃是全世界从古到今的唯一具有发展生命力的“文明”。他談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很明显，有时候很隱蔽；他所采取的方法，可以說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象他这样一个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的“历史学者”，可以說还是很少見过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湯因比是在資產階

級垂死阶段的一个企图动员历史来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以“大学者”面目出现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见性指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而历史的全部发展过程也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在这个时候，湯因比和资产阶级的另一些“学者们”，如经济学方面的凯因斯，哲学方面的罗素和雍格，提出了种种荒谬的学说出来打算收拾已经涣散了的人心，这好象是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漂浮的一根草，资产阶级纵使抓住了它也还是免不了下沉的。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历史研究”全书的主要内容。这部书十卷共分十三章：1. 序论、2. 文明的起源、3. 文明的生长、4. 文明的衰落、5. 文明的解体、6. 统一国家、7. 统一教会、8. 英雄时代、9. 文明之间的空间关系、10. 文明之间的时间关系、11. 文明的历史节奏、12. 西方文明的前景、13. 历史学家的灵感。在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湯因比的心目中，“文明”“社会”“教会”这三个名词是一个事物的三种称谓。他在使用这三个名词时，时常互相代替；而且在他看来，“教会”才是文明和社会的核心。在湯因比阐述他的历史材料时，神学也和历史占有同样的地位。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序论部分。在这一部分里，湯因比提出了他在进行研究历史时的几个根本概念。第一个概念是研究对象的范围问题。这个范围他称之为“历史研究的单位”（The unit of historical study）或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范围”（An intelligible field of historical study）。他在这里否认了国别史和断代史的研究价值而提出了文明史的概念。在他看来，只有以一个文明做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才能够真正说清楚历史的面貌。

文明是什么呢？文明就是社会。湯因比所以用文明这个概念而不用社会这个概念的緣故，是用来区别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这是他的第二个概念。根据湯因比的計算，自从有文明社会以来，在这个地球上一共出現过二十一个文明。就是：1. 西方基督教文明、2. 拜占庭东正基督教文明、3. 伊朗文明、4. 阿拉伯文明（二者合为伊斯兰文明）、5. 印度文明、6. 远东文明、7. 希腊文明、8. 叙利亚文明、9. 古代印度文明、10. 古代中国文明、11. 米諾斯文明、12. 苏末文明、13. 赫梯文明、14. 巴比倫文明、15. 埃及文明、16. 安地斯文明、17. 墨西哥文明、18. 玉卡台文明、19. 馬彥文明、20. 俄罗斯东正基督教文明、21. 朝鮮日本文明。

第三个概念是关于在这二十一个文明社会之間的关系問題。湯因比認為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的想法是錯的；所有的文明都起源于埃及的想法也是錯的，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但是多到什么程度呢？他認為在这二十一个文明当中，有六个文明是属于最早一代的，就是：埃及文明，苏末文明，米諾斯文明，古代中国文明，馬彥文明和安地斯文明。其余的文明和它們分別有着亲属的关系，如希腊文明对于西方文明和东正基督教文明的关系那样。說明这种亲属关系的現象是在每一个文明的全部存在过程中都經歷着四个阶段：(1) 从混乱中出現的統一国家，(2) “間歇时期” (Interregnum)，(3) 統一教会，(4) “民族大移动” (Völkerwanderung)。在統一教会中产生第二个文明的种子，然后周而复始，再經歷它自己的四个阶段。根据湯因比的看法，只有极少几个文明发展到了第三代，其余的都还在第二代。

第四个概念是文明的时间 and 空間概念。湯因比認為自从在这地球上出現文明社会以来，迄今不过六千年，而人类的历史則已經

經過了三十万年。以六千年和三十万年相比，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时间比例是 50 : 1，因此文明的历史在时间上是极短的，从“哲学的意义上”說，这二十一个文明可以說是“同时出現的”。（这种說法真是一个詭辯！）至于在空間方面呢？湯因比沒有明說这个問題，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間来看，他是認為在原始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文明社会就象是投石激起的水紋一样，在水紋沒有蕩漾到的地方，就是“空白”。

湯因比在这序論里所提出来的几个論点，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呢？它們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們馬克思主义者認為从原始社会到今天，人类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从原始共产主义，經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資本主义社会而到社会主义。从这里再向人类的偉大理想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一切都已經被事实証明了而且將繼續得到証明的。但是湯因比的看法怎样呢？他認為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是同时出現的，从“哲学意义上”說，是沒有时间先后的；同时，在各个社会之間沒有发展关系，只有亲属关系；每一个社会都經歷它自己的四个阶段，而各个社会的四个阶段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些說法，对于一个稍有一点历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是牵强附会、荒誕不經的，更不用說是对于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了。关于这些問題，在下面批判文明的生长时，还要詳細談。

我在这里只先談一个問題，就是他的“四阶段論”。这个說法是他的这一派之所以被人称为“历史形态学派”（Morphological School）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什么称之为“历史形态学”呢？这是因为他們这一派完全是从現象看問題的，談来談去，不敢深入接觸問題的实质。这一派的开山祖师是德国的斯般格勒（Oswald Spengler），他在 1917 年发表了他的那本名著“西方的沒落”（Unter-

gang des Abendlandes)。在这一本书里，斯般格勒用生物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把历史的发展过程分成为生、长、老、死四个阶段。湯因比繼承了他的这个說法，又加以发展补充。湯因比是用这个“四阶段”来套所有的文明的；因为他硬套，所以就出現了許多莫明其妙的說法。例如，对于中国的古代史的四阶段，他是这样說的。春秋战国产生了(1)秦汉的統一国家，随后出現了(2)汉唐的“間歇时期”，在这个“間歇时期”里出現了(3)大乘佛教的統一教会，然后就来了匈奴等民族入侵的(4)“蛮族大移动”。根据他的說法，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多么簡單！多么合乎他的“邏輯”！可惜就是不是事实。佛教怎么会在两汉时期成了中国的統一教会了呢？

在他的这个四阶段論里，非常明显的暴露了他的唯心主义。这就是由教会孕育第二个文明社会的說法。根据历史現象，他看到——有时候他也是无法否認的——在社会发展到了一定时期的时候，社会的内部会分成为少数統治者和多数“无产者”的两个部分。关于“无产者”(Proletariat)湯因比有个荒唐透頂的解釋。“无产者”是什么人呢？他認為“无产者”是一群“既在那个社会内部，而又不属于那个社会的人”。在这里他是始終不敢使用“階級”这个字的。这些“无产者”，他称之为“内部无产者”，用以区别那些入侵的“蛮族”。对于外来的民族和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他統統称之为“外部无产者”。根据历史現象；他也承認“无产者”（主要是“内部无产者”），是創造第二个文明的人。但是如何創造呢？他認為是通过教会。而且只能通过教会。在他看来，在“少数統治者”不能繼續統治的时候，总是由教会出来收拾殘局的。然后在内部混乱再加上第四阶段的外来混乱的时候，逐漸就从教会，从人們的心里，精神上，出現了建立第二个統一国家的要求和条件。湯因比并

不是一个完全脱离实际的历史学家。不，他是个很会“联系”实际的。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時候，他是不断地联系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前途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未来命运，他是怎样看呢？他认为美英资产阶级（即少数统治者）今天正处在又一次“間歇时期”的末期。内部无产者（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和外部无产者（即社会主义阵营）都在日益壮大当中，在这种局面下，资产阶级的出路是什么呢？是在教会。他是主张用宗教的力量来对抗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运动的。在这一个关键问题上，湯因比就从一个“历史学家”变成了一个“神学家”。他在1957年出版了一本新著，書名叫“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An historian's Approach to religion），这绝不是偶然的。

三

湯因比的历史理論的第一个部分是他的关于“文明起源”（The Geneses of Civilizations）的学说。根据他的說法，属于第一代的六个文明是直接来自原始社会中起源的。原始社会是静止的，到今天还是静止的。原始社会的数量大得多，据说經他們調查登記过的就有六百五十个。为什么这六个社会变成了文明社会而其它社会却没有变成文明社会呢？还有，在这六个文明社会出现以后，又陆续出现了十五个文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湯因比的这个学说就是回答这两个问题。

湯因比在阐述他自己的主张之前先批評了两种学说：一个是种族說，一个是环境說。他认为文明的起源不是因为某种族比其它种族天赋优越，也不是因为这个种族所在地的自然环境特别安逸，特别有利于文明的起源。接着他就提出了他自己的学说，就是

所謂“挑战与应战”学說(Challenge and Response)。

他的这个学說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不是来自于历史研究，也不是来自于客觀調查，而是来自于神話的启示，来自于灵感。有一次他在讀歌德的浮士德时，讀到了上帝和魔鬼打賭的那一段，他忽然得到了灵感。他这样想：“如果上帝創造的世界是十全十美的話，又哪里会有魔鬼？如果没有魔鬼的話，又哪里会有‘挑战’？”因此他認為文明的起源是因为有了“挑战”的緣故，而魔鬼也是上帝的意旨。在这里他举了一系列神話上的例子，又举了中国的“阴阳”之說。他認為宇宙本是阴，然后来了阳，有了阴与阳，也就是說有了“挑战”和“应战”，就有了变化。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在这里，湯因比列举了六个最初文明的例子，为他的学說作証。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什么是挑战呢？在湯因比看来，挑战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环境，一种是人为环境，总起来可称为环境的挑战。在最初的六个文明面前只有自然环境的挑战，而在其余的十五个文明中則既有自然环境的挑战，又有人为环境的挑战。把这两种环境加在一起，他又根据形式的不同称之为五种“刺激”：(一)困难环境的刺激、(二)新环境的刺激、(三)打击的刺激、(四)压力的刺激、(五)懲罰(遭遇不幸)的刺激。在湯因比看来，挑战既是造成文明起源的刺激，因此所有的灾难都是“美德”，所有的不幸都是幸福。天灾人禍、侵略屠戮、压迫奴役、殘疾伤害等就都是應該欢迎的。

但是挑战也应当有个界限，或是說在两端都有个界限，一个是挑战的强度，够强与不够强的界限，挑战要达到一定强度才能够引起“成功的应战”，不到这个强度，挑战就无效。另一个是挑战的强度够强与过强的界限，如果超过一定强度，那么挑战与应战的双方实力悬殊，也不可能引起“成功的应战”。因此，湯因比又提出了一

个“中庸之道”的理論；天灾人禍、侵略屠戮、压迫奴役、殘疾伤害、不可沒有，但也不能过多。真是个典型的英国人的騙人論調。

为了証明他的論点，湯因比引用了不少历史材料。譬如他說古代埃及文明的起源是由于非洲北部土壤风化的緣故。由于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当时的非洲人民在这个挑战面前就采取了許多应战办法；一些人不肯改变生活方式居住在原地因而大量死亡了；一些人为了保留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向南方迁移，以致迄今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一些人留在了风化的土地上但是改变了生活方式变成了游牧民族；一些人既改变了居住地点，迁移到了尼罗河口三角洲，又改变了生活方式，变成了农民，創造了古代埃及文明；还有一些人跨越了海洋到达到米諾斯島上，創造了米諾斯文明；这个文明后来又孕育了古代希腊文明。这就是湯因比对文明起源的看法。他完全从表面上看問題，也就是从“形态”上看問題，而没有接触到事物的本質。我們知道，文明的起源，并不是由于自然环境的挑战，而是由于人类与自然做斗争。人之所以成为人，文明的所以出現，完全是由于人类在与自然界做斗争的过程当中，取得了胜利的緣故。文明并不是自然界的“挑战”造成的，而是人类的劳动創造的。湯因比在这里不但顛倒了因果，而且还用他自己主觀想象的一套来代替历史发展的規律。正因为他認為在人与自然环境做斗争中，自然是主体，因此，人类的命运一直是被动的和悲慘的。在这里他又染上了严重的“宿命論”的色彩。

上面举的是他所說的自然环境对于“第一代”文明进行挑战的例子，也就是他所說的那前二种刺激。現在再讓我們举他所說的“人为环境”对人类进行挑战的例子为証。第二代文明或第三代文明和第一代文明有着“亲屬”一般的关系，在第二代和第三代文明

的起源中，还有“人为环境”在起着挑战的作用，也就是他所說的那后面三种刺激。湯因比的学說在这一部分已經超出了历史科学的范围而闖入了政治的领域，他的許多說法，不但是恶毒的，而且还是反动的。

在“人为环境”的范围内，他分列三种刺激：打击、压力（压迫）和惩罚（遭遇不幸）。他說这些情况都是促成文明社会起源的动力（也就是他的所謂挑战）。但是他用了一些什么历史事实來說明这个问题呢？例如在說明打击的刺激时，他就曾引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为例。他認為三十年代希特勒納粹反动势力的出現是由于德国在1918年战敗了，而法国又在1923—1924年占領了魯尔地区的緣故。这簡直是胡說。在說明压力的刺激时，他引用了埃及古代史，伊朗古代史，俄罗斯东正教史，西欧中古史和近代史上的許多例子。他說土耳其帝国进侵維也納，促成了奥匈帝国的出現。在这里他把文明和政权又混为一談。土耳其帝国的灭亡他始終沒有說清楚，而只是說奥匈帝国所以灭亡是由于土耳其人不来进攻維也納了。至于經濟原因則完全沒有談到，而民族运动也輕輕的一笔帶过。至于說惩罚（遭遇不幸）的刺激就說得更离奇了。他認為跛子、盲目都是发展特殊才能的好条件；奴隶制度可以发展宗教信仰，說不定基督教的前途要完全依賴美国的黑人教会；各种各样受奴役受迫害的人，如在中古世紀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Phanariots），在沙皇时代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夸山利人（Qazanlis）以及在土耳其帝国統治之下的羅馬天主教徒（Levantine），最后还有犹太人，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在各种各样的迫害之下发展了自己的“才能”，創造了自己的“文明”的。这种种說法，对于一个稍有点历史常識的人，都会感到是莫名其妙的。可是

湯因比却儼然摆出一副历史学者的面目来引經据典地加以“科学研究”而且得出“結論”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对于今天我国讀者是极简单，极容易了解的。因为湯因比的历史研究，处处都在說明资产阶级的历史科学做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是反动阶级的工具，处处都反映了作者的阶级观点和立場。湯因比是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言人，他的著作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此他的一切理論都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立場出发，轉过来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制度服务的。为了从思想上模糊事实真相，麻痹人民意識，他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而且还有許多捏造的地方。这一切都不难在書里找到。

四

湯因比的这些看法是从哪里来的呢？除了他的阶级出身是个根本問題之外，还自有其特殊的形成过程。在1948年他出版过一本論文集，叫做“文明在考驗中”(Civilization on Trial)，其中第一篇文章叫做“我的历史观”(My View of History)。在这里，他是这样說的：

……如果打算說明我个人的历史观，就需要說明它的来历，发展和社会与个人的背景。……我从小受的是一种旧式教育……我学的全是希腊和拉丁的古典作品……我認为这种教育对于任何一个想做历史学家的人，都是无价之宝。……現存的有关希腊罗马的历史材料在份量上不多不少，而且在各方面都分配得非常均匀……这样就可以培养一个历史学家的正确“比例感”(Sense of Proportion)……此外学希腊罗马历史的最大优点是培养一个人的广闊的而不是狹隘的观点。……

……当我在希腊徒步旅行的时候……我在咖啡店里第一次听到了(英国的所谓)外交政策的事。但是即使在那时,我也还没有意识到我们也生活在历史当中。……大战来了……在我重读(古代希腊史学家)修息第底士(Thucydides)的著作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和他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原来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相同的;这样在事实上,他的“现在”便成了我的“未来”。……如果希腊罗马和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岂不是所有的文明之间的关系,也都是这样吗?……

这样,做为人类社会历史的文明就是一些同属于一个时代的“平行体”; (在过去五六千年中)人类曾经进行了二十次左右的努力,企图克服他们已经昏睡于其中几十万年的原始状态。有些地方如新几内亚(New Guinea), 富埃哥地方(Tierra Del Fuego), 以及西伯利亚的东北地区到今日还处于原始状态中……这个差别所在很可能就是解决……“宇宙之谜”的地方。

……1920年纳米埃教授介绍我看斯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这本书。在我看了这本充满了天才的历史预见的著作以后,我觉得好象我的问题都已经被他解决了。我的一个主张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应当是社会(文明)……另一个主张是一切社会(文明)都是同时代的而且是平行的……这两点他都谈到了。但是在我进一步想探讨文明的起源时,我发现原来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因为在我看来,斯般格勒对于这个问题是教条得厉害,而且还是个“宿命论者”。根据他的看法,文明的起源,发展,衰落与消灭都是根据一个一成不变的时间表进行

的，……而且还肯定这是一条自然法则……没有理由，你只要相信“造物主”就行了……而在这里我却认为应当注意民族传统上的差别。……（但是）我当时如果知道雍格（C. G. Jung）的著作，我也许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些启示。我的启发是从歌德的浮士德那里得来的，……

歌德的（浮士德中的）“天堂序曲”的开端就是天使齐声歌颂上帝创造的完美无缺。如果他的创造是真的完美无缺点的话，那么这位创世主就不再有可能有进一步进行创造的可能了……于是就来了梅斐斯脱非利斯（Mephistopheles）向上帝挑战，问上帝敢不敢答应他尽量进行破坏……这样就有了以挑战和应战形式出现的两个人物……魔鬼并不是永远都失败的……如果说文明起源的原因是挑战和应战……那么文明的衰落（越轨）和死亡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文明死亡的一般情况是由于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越来越不守纪律的“无产者”和一个越来越无力进行统治的“少数人”。死亡的过程并不是一直在走下坡路的，它也有起伏，……在最后一次“伏”以前，统治的“少数人”会采取一种“统一国家”的办法来暂时维持一种“和平”局面，（但是）在这种“统一国家”的内部，“无产者”却会创造一种“统一教会”……等到这个文明最后瓦解了的时候，统一教会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成为孕育另一个新文明的种子……（这样）一个文明的死亡就促成了另一个文明的诞生……。

根据这段话看来，在汤因比的历史观当中，有几点极可注意的现象。他是个资产阶级在历史科学方面的代言人，这一点不必说了。另外他还是个培养历史学者的老式教育制度的崇拜者，同时